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2年6月6日 (第261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 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三种战略框架

中美关系处于变化的早期阶段，全球新兴技术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仍有待观察。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关注未来的同时应该保留和扩大美国的选择面。美国应该以“进攻性”政策为主，以“防御性”手段为辅，在战略技术领域采取激励措施，鼓励新投资，拓宽人才渠道，增强供应链弹性。

# 中美关系

## CNAS 专家：美中潜在“军事冲突”恐引发核战争担忧

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杂志网站 5 月 20 日登载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 高级研究员兼国防项目主任史黛西·佩蒂约翰 (Stacie Pettyjohn) 等人的文章称，俄乌冲突引发了世界对核战争的担忧。若台海爆发战争险情，而美国选择军事干预，战争升级的风险恐超过当前的欧洲局势。文章摘要如下：

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致力于发展“世界级军队”以及“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 战略，以寻求在“台湾问题”上能够抵御来自第三方的军事干预。大陆不断增长的核武库也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军事影响力以及潜在的新作战能力。据美国国防部估计，到 2030 年，中国大陆将拥有大约 1000 枚可交付弹头，是当前数量的三倍多。并且，一旦北京决定采取军事手段收复台湾地区，其决心不容小觑。基于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核武库扩张以及大陆收复台湾决心的多重考量，在现实世界中，中美之间若爆发军事冲突，局势恐怕会迅速升级，且存在上升为核战争的风险。

为了避免美中潜在“军事冲突”的迅速升级，美国需要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常规能力。具体来看：第一，美国需要通过扩大远程弹药储备和提高水下作战能力来维持其常规军事优势。第二，即使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美国必须确保在第一、第二岛链内仍拥有进攻能力。美国需要新的基地来分散军队，以增强其生存能力。第三，美国需要发展一个由愿意为台湾“防务”做出“贡献”的合作伙伴组成的一体化网络。盟友体系是美国对华的一种不对称优势，美国应该积极与关键合作伙伴进行战略和行动规划，向中国大陆发出“保卫”台湾地区的坚定信号。

## CSIS 专家：美国应发展非金融性制裁措施以应对中国对美元主导地位的挑战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 5 月 20 日登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和政治学杰出教授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的文章称，中国正努力发展额外的工具来进行金融计价和执行交易活动，这导致西方金融制裁效用不断下降。像美国等依赖于金融制裁的国家应该考虑开发非金融性制裁措施以应对这一挑战。文章摘要如下：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是银行使用标准代码和格式向其他国家的银行发送指令的消息系统。“9·11”之后，SWIFT 开始与美国共享专有数据，并日益成为美国政府监控第三方遵守制裁与否的工具。被禁止加入 SWIFT 的银行将不得不寻找另一种与外国客户和交易方沟通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往往成本更高，安全性较低，速度极慢。除了 SWIFT，美国的金融体系中还有一项机制同样十分重要，即“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通过 CHIPS 结算的交易均以美元计价，因此，该系统有助于维持美元主导地位，阻碍其他政府将其货币国际化的努力。

由于担心对美西方金融基础设施的依赖会导致行为的不自主，中国自 2015 年以来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平行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CIPS 的主要功能和组织方式与 CHIPS 类似，是一个实时全额结算系统。然而，很难说 CIPS 已对美元主导地位构成了威胁。全球约 1.1 万家金融机构使用 CHIPS，而使用 CIPS 的只有 1300 多家。并且，尽管 CIPS 的交易额在逐年增长，但 CHIPS 处理的交易数量与之相比高出近 40 倍。

若美中之间没有制裁关系，也不涉及军事冲突，那么上述体系将是共生并行关系、甚至会出现重叠。然而，在美中关系破裂的极端情况下，则可能会出现两个自成一体的货币和金融体系：

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使用美元的西方体系和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使用人民币的东方体系。而中国的替代方案将吸引那些担心成为美国制裁目标的国家。对此，像美国这样依赖金融制裁的国家应该提前做好准备，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挑战。

## 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三种战略框架

美中关系处于变化的早期阶段，全球新兴技术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仍有待观察。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关注未来的同时应该保留和扩大美国的选择面。美国应该以“进攻性”政策为主，以“防御性”手段为辅，在战略技术领域采取激励措施，鼓励新投资，拓宽人才渠道，增强供应链弹性。

近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官网登载该机构技术与国际事务项目高级研究员乔恩·贝特曼（Jon Bateman）的报告，详细分析了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思想演变和现状，并总结了美国国内的三种主流战略框架。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目前，美国和中国在技术生态领域的部分“脱钩”正稳步进行，美国政府是主要推手。自 2010 年以来，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以及愈发“强硬”的国内外行为导致美国领导人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开始将其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主要威胁。自此，美国政府对技术“脱钩”的兴趣急剧上升。美国早期的行动体现了“防御性”，包括一系列旨在挫败或遏制中国技术发展的限制性措施（如进出口管制、签证禁令等）。最近，华盛顿增加了对“进攻性”措施的关注，即投资和培养美国自身技术实力。

美国不能轻视技术“脱钩”，若缺乏明确战略，美国政府未来的对华“脱钩”行动可能会趋向混乱和失控。截至目前，美国国内主要存在三种技术“脱钩”的拟议战略：

首先，“限制主义”阵营认为美中科技关系是零和的，更有利于中国，因此需要大幅削弱双边科技关系。这一群体主要包括对华鹰派、人权捍卫者及国家安全官员。

其次，“合作主义”阵营认为美中科技关系是非零和的，很大程度上对美国有利，对华盛顿现阶段推行的“脱钩”议程持怀疑态度。该群体包括了许多商业利益集团、技术全球化推动者以及一些进步人士。

最后，“中间派”阵营认为美中科技关系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既有零和也有非零和因素，两国的成本和收益混杂。“中间派”认为美国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重点关注国内技术发展，对华采取有针对性的、微调的防御性举措。这个群体包括了许多主流智库分析师、温和派政客以及地方官员。

美中关系处于变化的早期阶段，全球新兴技术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仍有待观察。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关注未来的同时应该保留和扩大美国的选择面。美国应该以“进攻性”政策为主，以“防御性”手段为辅，在战略技术领域采取激励措施，鼓励新投资，拓宽人才渠道，增强供应链弹性。但由于“进攻性”投资实施起来具有挑战性并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获得回报，因此美国需要以“防御性”手段来争取发展时间。“中间派”策略可以通过确保技术限制的针对性和精确性在最大限度上降低因“脱钩”而产生混乱的风险。

## 美学者：坚持征收关税能助美国降低对华贸易依赖

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杂志网站 5 月 22 日登载哈佛大学青年学者乔治·叶恩(George Yean)的文章称, 取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对降低美国国内通胀率的效用不大, 相反, 坚持征收关税或许能够帮助美国降低对华贸易依赖, 实现供应链的战略转移。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拜登政府面临的重大国内挑战之一是持续攀升的通胀率。对此,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以协助解决该问题。然而, 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研究显示, 即使美国取消所有“贸易战”时期的关税, 通胀率只会一次性下降 1.3 个百分点, 这对于当前 8.3% 的通胀率来说帮助不大。

面对中国对美国每年高达 4000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特朗普政府实施了保护主义关税, 关税产生了即时效用。2019 年, 美国对华进口额由 2018 年的 5380 亿美元下降至 4500 亿美元,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由 4200 亿美元下降到 3440 亿美元。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关税似乎至少可以作为减少经济依赖的手段之一。

根据传统观点, 经济相互依存能减少冲突。然而事实上, 相互依存不一定能阻止战争, 有时还会导致冲突。经济上依赖“不友好政权”会带来诸多问题, 安全风险可能远远超过经济收益, 俄乌冲突爆发后能源供应中断就是明证。从美中双边贸易数据来看, 中国依赖美国市场, 而美国依赖中国的供应链。面对美中之间可能爆发的不寻常事件, 若中国“威胁”切断供应, 美西方可能将被迫采取消极政策。

美国大战略的首要目标是捍卫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若中国追求保持现状, 美国应该无需过分担心。但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巨大进步给美国带来了所谓的“政治不安全感”。贸易日益成为中国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工具。随着中国成

为美国许多盟友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发现越来越难说服这些国家在具体议题上加入己方阵营。并且，中国在广大发展中世界的贸易和投资实力使美国的有限援助相形见绌。

对美国而言，将贸易向盟友转移能够通过内化安全风险来扩大福利。美国只要将从中国进口的一半商品逐渐转向印度和东南亚及拉美地区国家，就能发挥巨大影响力，提振民主国家经济。此外，如果更多的终端产品在印度和墨西哥组装，也能倒逼日本、韩国等供应大国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关税是美国实现贸易转移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战略步骤。

未来，美国可能会考虑所谓的“善治”关税（good governance tariffs）。如果世界陷入“民主”和“威权”之间的斗争，部分去全球化或许是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确实带来了危害，但取消关税不会有太大帮助。并且，关税一旦取消，国家在政治上便难以寻得能够发挥同等效用的政策工具。

## 美国外交

### 美法务专家：美国应将税收纳为对外经济制裁措施

近日，美国《法律事务》(Lawfare)网站登载弗吉尼亚州税法中心主任安德鲁·哈亚史(Andrew Hayashi)的文章称，美国应将税收纳入对外经济制裁工具箱中。文章摘要如下：

所得税历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主要是为了将美国对外投资引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然而，美国的税收制度较少用于向对手国家施加经济成本，且其希望达到的外交政策目标通常较过时，容易受到忽视。因此，美国应该制定一个全面的、具有前瞻性的方式将税法巧妙地运用到对外经济制裁中。

将税收纳入经济治理工具箱中并非易事，但十分必要。国会应让税收政策在外交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美国的所得税管辖区域全世界最大，美国政府可以借此实现更广泛的外交政策目标。其次，税法的激励措施是可调整的，具有内在灵活性。美国在利用税收政策对特定外国实体和个人实行制裁时，能够进行逐级调整，避免外国公司和个人出现大规模撤离。最后，所得税的作用点与其他经济工具不同，增加税收这项工具可以丰富美国制裁的着力点，降低金融制裁、关税和其他经济工具被过度使用的风险。

### **韩专家：美韩应继续加强技术合作以增强全球竞争力**

美国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网站 5 月 20 日登载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前副院长郑亨坤（Hyung-Gon Jeong，音译）的文章称，美韩应从增强供应链弹性、控制战略资产出口及推动多边合作三个角度出发，增强两国的技术竞争力。文章摘要如下：

世界主要国家都在为保障高科技产业的全球供应链而展开激烈竞争。美韩共同面临的供应链风险是其物品的进出口过度依赖于某个特定国家和地区。韩国约 70% 的关键商品由中国进口，并且，其每年出口的半导体中有 61.5% 流向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美国的情况类似，2021 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半导体占其半导体出口总量的 29.6%。美韩两国都有必要在高科技领域减少对华依赖。基于此，文章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美韩应协力打造有弹性的供应链。韩国大部分半导体设备从美国进口，但美国半导体设备行业在过去 20 年里逐渐丧失优势。美韩的合作既可以提高美国半导体设备和零部件产业的

竞争力，也能提高韩国半导体设备行业的供应链弹性，共同抵御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在设备市场带来的竞争压力。

第二，美韩应加强对战略资产出口的控制。两国可以对技术销售渠道进行全面监管，防止非必要的技术转让。但需要明确的是，出口管制应该出于特定的安全目的，具有针对性，以免对两国产业造成意外伤害。此外，两国还要加强对外投资的资格审查，共享相关信息，防止特定技术外泄。

第三，美韩应合力推动多边合作。首先，美韩应利用现有的多边机制（如 IPEF），解决供应链、网络安全、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保护 and 贸易补贴等问题。其次，两国应强化其在世贸组织中的联盟关系，改善数字贸易环境。最后，两国还可以扩大《信息技术协定》（ITA）的作用范围，取消对新技术产品征收的关税，加强市场准入规范管理。

### **美学者：美国应协助印度在武器市场上取代俄罗斯**

美国 War on the Rocks 网站 5 月 20 日登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瓦萨布吉特·班纳吉（Vasabjit Banerjee）等人的文章称，美国应协助印度成为武器出口大国，在替代俄罗斯的同时阻止中国的武器贸易发展。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主导着全球高端武器市场，但对于国防预算有限的国家而言，“价廉物美”的武器市场更具吸引力，而此类市场由俄罗斯主导。通过向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出售老式或翻新的国防设备，俄罗斯扩大了在这些地区的政治影响力。然而，在俄乌冲突的影响下，俄罗斯可能无法继续满足该市场的需求，这引发了“谁将填补俄罗斯空白”的问题。美国政府认为法、德等传统武器供应国存在生产成本低、制造率低等问题，缺乏争夺该市

场的潜力。因此，中国最有可能取代俄罗斯在该市场的地位。

中国在武器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始终保持着在南半球的市场竞争优势。对比来看，印度并非传统的武器出口国，也缺乏启动本土国防制造的资金和研发能力。但印度极具发展潜力，并有望在未来十年内成为武器出口大国，这符合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利益。

为了协助印度成为世界武器出口大国，美国可以采取以下三项措施：首先，接纳印度作为美国主要防务合作伙伴的角色，加快对印军售的出口管制审查。美国商务部应该促进美国公司和印度合作伙伴之间的谈判，简化流程，扩大美国公司对印投资的机会。其次，将美国传统的武器生产线转移到印度。生产线的转移可能导致失业，因此该政策在政治上通常不受欢迎。对此，美国应保证相关公司获得外移许可收入，并确保关键部件继续在美国生产。最后，支持印度建立透明的采购和决策程序。美国应该利用其在私营部门参与、采购程序和决策流程透明化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帮助印度精进相关能力。

## **哈德逊研究所学者：俄乌冲突为拜登政府提供了新中东机遇**

美国《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网站近日登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研究员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文章称，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挫败为美国重建中东安全联盟带来了机遇。文章摘要如下：

俄罗斯之前利用美国的战略失误，成功介入了中东政治，在该地区重塑了大国地位，这一事实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地区威望。拜登上任后，将重启伊核协议作为中东政策的核心，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甚至是以色列态度冷淡。再加上美国战略重心的持续东移，

种种政策导致美国在中东的处境变得愈发糟糕。然而，俄乌冲突不仅削弱了俄罗斯在欧洲的实力，还打击了其中东的利益，为美国带来机会。

美以关系是世界上最亲密、最有效的伙伴关系之一。然而，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美以关系同样面临压力。美国对以色列日益右倾的巴勒斯坦政策感到不安，而以色列也对美国的伊朗政策及其对中东的长期承诺感到担忧。并且，美国低估了以色列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大约 120 万以色列人是前苏联移民，许多人与留在当地的家人和朋友间保持着联系。此外，在意识形态上，西方反犹太复国主义日益“觉醒”，疏远了许多以色列人。

俄乌冲突爆发后，事态发展似乎推动着两国重修旧好。首先，拜登政府至今不愿接受伊朗重启伊核协议的条件，有望在中东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这给了以色列希望。其次，乌克兰犹太总统与俄罗斯抗争的形象鼓舞了许多以色列人。最后，为了团结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者，普京的追随者开始使用反犹太的比喻，这警醒着以色列人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中的反犹主义。

建立一个包括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在内的中东联盟，以有限的代价维护美国的重要利益，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这一成就虽然遭到前两届政府的“破坏”，但俄乌冲突给拜登提供了挽回局面的机会。欧洲局势提醒美国政府，中东对美国安全和全球体系至关重要。问题在于拜登政府能否摆脱前任失败的阴影，重新构建能够确保美国在中东主导地位的现实框架。

### **CNAS 专家评拜登就职后的首次亚洲行**

近日，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登载该机构多位专家的集合文章，对拜登就职后的首次亚洲行进行了点评。主要内容如下：

**CNAS 的 CEO 理查德·方丹 (Richard Fontaine):** 拜登过分强调台湾问题以至于忽略了更重要的贸易议题。在访日期间,拜登再次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点性,并“承诺”美国愿意动用军事力量“保卫”台湾地区。这已是拜登第三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如此言论,而白宫方面每次都迅速做出回应,表示美国的“战略模糊”立场没有改变。此外,拜登还推出了酝酿已久的“印太经济框架”,但“框架”的相关定义和优势仍模糊不清。IPEF 不过是美国为了恢复在该地区经济领导地位迈出的一小步,远无法填补美国亚洲贸易政策造成的巨大缺口。

**CNAS 印太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雅各布·斯托克斯 (Jacob Stokes):** 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立场是更优选项。在亚洲行期间,拜登针对台湾问题再一次发表了争议性声明,这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应该支持“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明确”的激烈辩论。保持战略上的模糊性——无论说法多么陈旧——仍然是最优选项。第一,“战略模糊”保留了美国干预与否,干预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选择权。第二,“战略模糊”能够留给日本充足的空间推进相关安全政策的讨论,无需被迫明确说明将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第三,“战略模糊”能够间接促使台湾地区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

**CNAS 高级研究员兼印太安全项目主任丽莎·柯蒂斯 (Lisa Curtis):**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日益成为美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战略的关键抓手。在东京召开的、面对面的“四方安全对话”首脑峰会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该机制已经逐渐成为美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战略的关键抓手。会上,美日印澳发表联合声明,重申“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海洋秩序”的决心,反对“在南海、东海等争议海域存在任何可能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借由此次会议,四国正式提出了一项基于卫星的重要海事倡议,以监

测印太航道、提高集体海域意识 (MDA)，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海域。此外，东京峰会还明确了该组织的六大优先合作领域：疫苗、关键新兴技术、气候问题、空间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网络安全问题。

**CNAS 高级研究员兼能源、经济和安全项目主任艾米莉·基尔克里斯 (Emily Kilcrease) :**若缺乏美国市场准入激励政策，IPEF 能发挥的效用有限。经过数月的准备工作，拜登终于在日本宣布正式启动 IPEF，并公布了初始成员国名单。然而，IPEF 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任何具体的议程框架。IPEF 目前的松散性不利于美国推进相关政策，并且，若没有更完善的美国市场准入激励机制，IPEF 能发挥的效用将十分有限。

对拜登政府而言，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的影响，一个有前景的 IPEF 倡议应该首先将供应链安全和弹性问题囊括其中，包括用于监测关键部门中断问题的预警系统。其次，IPEF 应协助美国加强与日本、韩国等在关键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成员在出口管制方面的合作。再次，数字贸易同样重要，对此，美国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说服印度等国放弃长期建立的数字贸易壁垒，促进真正开放的跨境数据流通。最后，IPEF 还必须包含严格的劳工和环境保护标准，这是组成高标准协议的基本要素。

## 美国政治/其他

### 美学者：新冠企业救助法案的潜在问题

美国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网站 5 月 19 日登载该机构联邦预算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师理查德·斯特恩

(Richard Stern) 的文章，对近期参议院正在考虑的一项新冠支出法案进行了详细分析。文章摘要如下：

参议院正在考虑一项价值 480 亿美元的企业救助法案，法案中 96% 的资金将用于餐厅和小企业的复兴。该法案是拜登政府《美国救援计划法》(American Rescue Plan Act) 的延伸，旨在将财富重新分配给由政府精心挑选的公司。然而，此项企业救助法案恐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该法案的补贴对象、标准和后续税务问题模糊不清。首先，法案中缺乏将补贴与企业当前的收入水平联系起来的审查机制，因此，资金将极有可能被用于已不再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企业。其次，该法案的补贴旨在抵消疫情期间的收入损失，而损失被定义为公司在 2019 年及 2020 年之间的收入差额。这样的标准难以反映收入减少与新冠之间的实际关联性。最后，补贴不仅不会被计入应税收入当中，还可用于企业申请税收减免，因此，补贴或许会成为企业避税的新手段。

第二，法案缺乏开支抵消方案。过度的政府支出延缓了经济发展。由于没有相应的抵消政策，仅在过去两年，国债就增加了近 7 万亿美元，将美国推向近 40 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胀率。该法案不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还代表着政府权力的进一步扩张。

第三，该法案专注于已度过困境的企业，反而忽略了大量失业人员，这将无助于经济恢复。

### **美专家：政治左派应关注弱势群体被“控枪”限制的权益**

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 网站 5 月 27 日登载哈特兰研究所 (Heartland Institute) 政策顾问大卫·达马托 (David S. D'Amato) 的文章称，枪支管制本质上具有反动性、倒退性，严

格的枪支法会助长国家行为者的特权以及打击弱势群体的自卫权。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近年来，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枪击案件频发。然而，限制个人获得枪支能力的法律并不适用于解决大规模枪击案流行的问题。枪支管制本质上具有反动性、社会倒退性。这些法律实质上主要限制的是边缘化少数群体（尤其是美国黑人）的枪支获得权，这会将其置于不公平的弱势地位。

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在打击普通公民合法自卫权的同时，却保留了国家行为者的特权。特权者全副武装，在美国国内造成了严重且有据可查的警察暴力问题，但他们的特权仍然完全不受影响。

此外，枪支管制在现实世界中产生的实际影响带有种族主义和歧视性。例如，在伊利诺伊州，因持有枪支而被起诉和被判二级重罪的人中有 83% 是黑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纽约，尽管居民中黑人数量不到 20%，但在所有“持有枪支重罪案件”中黑人占比近 80%，相比之下，占总人口 70% 的白人仅占 7%。

有色人种、穷人、性少数群体（LGBTQA+）等弱势群体比特权群体更需要枪支权利。如果以非理性和狭隘的政策来应对悲剧，此类人群将遭受最大损失。

### **民调网站 538：共和党对拉美裔选民依然具有吸引力**

美国民调网站 538 (Five Thirty Eight) 近日登载该站政治记者亚历克斯·萨缪尔斯 (Alex Samuels) 的文章称，虽然共和党长期宣扬强硬的移民政策和种族主义理论，但共和党对部分拉美裔选民仍然具有吸引力。文章摘要如下：

拉美裔选民如何看待共和党所宣扬的种族理论因人而异，决

定性因素包括他们在美国生活的长短、居住的街区以及受教育程度。虽然拉美裔选民总体上倾向于民主党，但有些人对共和党持开放态度，接受美国民族主义，甚至会在某些移民政策和种族问题上将自己视为保守派。

据皮尤研究中心去年 3 月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受访者中有 57% 的共和党或倾向于共和党的拉美裔成年人表示“美国国内过分关注种族问题”，且只有 28% 的人表示，基于种族或肤色的歧视是美国当下面临的“非常大的问题”。根据民调数据，有 60% 的拉美裔成年人表示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维权运动，这一比例明显低于亚裔成年人（68%）以及黑人成年人（83%）。

此外，拉美裔选民在移民问题上持保守态度。由于大量拉美裔是通过合法渠道移民美国，其家庭在美国可能已经生活了几代人，他们并不担心自己和家人可能被驱逐出境。因此，共和党人关于墨西哥人和移民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不太容易让其失望。并且，拉美裔对于自身的“白人身份认同”愈发强烈，这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共和党所宣扬的“开放边界”将威胁美国安全的言论。

虽有上述种种证据表明共和党对拉美裔具有吸引力，但目前绝大多数的拉美裔选民依然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共和党的种族主义言论是否会适得其反，仍有待观察。

## **皮尤：美国人对政府是否应该加强对科技公司的监管存在党派差异**

近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登载该机构互联网和技术研究助理艾米丽·沃格尔斯（Emily Vogels）的文章称，相比 2021 年，支持对大型科技公司增加监管的美国

人有所下降，这种趋势在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人士中尤为显著。并且，社交媒体网站对其平台内容进行政治审查的情况也愈发明显。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据皮尤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目前有 44% 的美国人认为大型科技公司应该接受更多监管，这个比例低于 2021 年的 56%。相反，表示希望政府减少对大型科技公司监管的人数却大幅上升，相比 2018 年大约翻了一番。这些变化在共和党人及其支持者中尤其显著，特别是其中的保守派人士。过去一年间，赞成加强监管的保守派共和党人的比例由 59% 下降至 35%，而主张减少监管的保守派共和党人由 11% 增加至 36%。温和派和自由派共和党人的变化趋势与之类似，但变化程度不明显。虽然自由民主党人对加强监管的支持率也由 70% 下降到 58%，但希望减少监管的人数并没有相应增加。相反，认同当前监管水平的自由民主党人的比例由 23% 上升至 32%。

此外，在这项新调查中，77% 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公司极有可能正在对其认为不受欢迎的政治观点进行审查，这一比例与往年相比略有上升。这种观点同样在共和党人群中尤其普遍。92% 的共和党人及其支持者赞成该观点，保守派共和党人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95%。相比之下，民主党人和倾向于民主党的独立人士认为社交媒体网站极有可能（21%）或有可能（45%）审查其认为不合适的政治观点的比例要小得多。

关于科技公司政治观点偏好的问题，44% 的美国人认为这些公司倾向于支持自由派而非保守派的观点，这一比例与前几年数据相当。按党派来看，71% 的共和党人表示科技公司更倾向于自由派观点，而仅有 26% 的民主党人持相同态度。相较而言，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有可能赞同这些公司平等地支持两派观点。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mailto:bianjibu@sias.org.cn)